

再談澳門學

郝雨凡

[提 要]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澳門積累了不勝枚舉的文化遺產和豐厚的文化底蘊,既對中華文化的傳統有着很好的保留,同時也對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認識,逐步形成了“中西交融,多元共存”的澳門文化。這種獨特的文化及其蘊含的充滿智慧和和諧相處之道,給澳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提供了廣袤的學術發展前景。澳門學,應當跳脫於地區學的框架限制,建構以不同文明“互動相生”為核心的學術範式,去挖掘澳門地方知識體系的全球意義,為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發展提供澳門經驗。

[關鍵詞] 澳門學 學術範式 文明互動

[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25-09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使澳門一度成為東西方貿易發展的匯集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賈、教士及移民停留與居住,使得這座東方小城成為中國看世界,世界看中國的一扇窗戶,成為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澳門也被喻為“世界型的土地與海洋”^①。在 400 多年的滄桑變化中,澳門在東西方文明的相遇、碰撞和交融中不斷自我調適,既倔強而獨立地堅守了中華傳統文明中的精華,又相容並包地吸納了西方文明的優異之處,最終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澳門文化”。儘管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各種文化都具有對內凝聚團結、對外體現整體特徵的作用。澳門文化以及其在不同文明的衝突、調試、共存、融合的演變過程為國際學術界提供了一種文明和諧互動交融的素材,也使得“澳門學”作為一種學術概念被提了出來。

一、澳門學的提出與發展

自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澳門學被提出至今已經有了 35 年的歷史。當時中葡兩國正協商解決澳門問題,造成澳門地區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動蕩,也觸發了知識界對澳門現實問題、未來發展等諸多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陳樹榮、黃漢強等學者最初提出“澳門學”概念,是希望將澳門學術研究回歸現實並服務發展。澳門學的命名與提出儘管一開始在學術上並不十分自覺,但對澳門研究的熱情和士氣具有明顯的提振。這期間圍繞着澳門學展開的學術研究出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論文,如黃漢強的《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1989)、吳志良的《舊話重提“澳門學”》(1996)、湯開建的《“澳門學”芻議》(1998)、趙利峰的《澳門文獻整理研究與“澳門學”》(2008)、林

廣志的《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2010),郝雨凡等《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2011)等。^②在過去 15 年間,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為澳門學的研究不斷注入動力。澳門大學一度將“澳門學”作為重點人文學科加以建設,並制定了澳門學研究與發展規劃,希望能逐漸將“澳門學”推向國際主流學術界。

但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澳門學的發展似乎並沒有走得太遠。澳門學的學科涉獵廣泛,涉及歷史研究、跨文化研究、法律體系研究、文明互動研究、區域發展研究、經濟發展研究、社群研究和城市研究等諸多方向。但恰恰是廣泛的學科涉獵導致澳門學出現學科發展參差不齊的現象。目前,史學研究一枝獨秀,法學研究次之,這一方面是與這兩類學科研究的相關學者較為集中緊密相連,另一方面則是“一國兩制”下澳門地區的特殊法律、行政管理等制度所帶來的研究特殊性。但除此之外,澳門學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語言、宗教等相關領域的拓展進度參差不齊。雖然沒有帶動起一個可持續性的和具有普遍學術價值的學理上的研究突破,但這些學術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澳門學逐漸浮出了學術的地表,並在澳門學發展的必要性上達成共識。澳門學也開始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30 多年來,人們對澳門學似乎還停留在兩種基本的理解上。一種將其看成單純的歷史學研究,認為澳門學就是以澳門史為重點,以文獻檔案為基礎,探討 16 世紀至 19 世紀中葉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角色的史學研究。另一種是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澳門研究,認為一切有關澳門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問題都在其研究範圍之內。這兩種理解導致澳門學的研究現狀呈現出兩種困境,一是長期停留在地區學的層次上,即使是澳門史的研究,也較少與中國史、歐洲史乃至全球史深入交融;二是更具功能性的着眼當前澳門問題的研究,焦點集中於單個學科領域或問題上;史學研究和現實研究各成一體,互不連接,且又古今割裂,這使得澳門研究難以發揮以史為鏡、鑒古知今的現實功能,而且也遠離國際學術主流。

從根本上來說,澳門學的學科發展參差不齊、各自為戰現象的背後是學界對澳門學內涵和目標的理解尚不一致,也缺乏宏觀的研究框架,學者往往將其討論的焦點集中於單個學科,希望實現個別突破。然而,無論是以澳門歷史文獻研究為重點還是以澳門社會抑或是澳門文化為重點,都在強調自己領域的重要性,而較少能與其他學科做到相互交流滲透、相互借鑒並有系統的並榮發展。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澳門學似乎只是單一的研究澳門,而幾乎所有關於澳門的研究都可以被命名為澳門學。這種研究思維嚴重影響了各大學科之間的研究關聯性,無法互相支撐,形成一個有針對性的系統研究。這也致使澳門學離獨立的“學”的概念尚有距離。如果繼續這樣,澳門學仍然是將任何有關澳門的研究都包羅在內的大雜燴,僅僅擁有數量上的積累與增長,很難實現有關澳門學問的規定性和整體性的把握以及學理上質的提升,而後者才是澳門學長久發展的核心要義。

任何一個文化區域都擁有屬於它的較為完備的知識系統,而且都有各自的特色,人們因此可以構建不同類型的“地區學”,例如“嶺南學”、“上海學”等。本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是指一個與自然環境互動歷史悠久的社會所產生的認知、技能以及價值觀,是地方在教育、安全、醫療健康等社會、經濟活動層面決策的重要基礎。本土知識是基於廣泛而深厚的實踐經驗,並與其被附着的物理和社會載體無法脫離的。但如果這種知識系統不具有明顯的縱向的深邃和橫向的廣闊,則很難提煉出可供比較和借鑒的全球意義。

不可否認,澳門作為中國向外瞭望、對外接觸為內涵的近代化歷史的早期支點,一切有關於這段歷史的文明積累和文字材料,都顯示着中國融入世界、擁抱海洋文明的最初的完整資訊,有關澳

門歷史的學問與中國近代歷史息息相關，屬於具有鮮明近代色彩的中國歷史的獨特分支。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儒家經典、地圖地理、文學藝術、園林建築、中醫中藥、生活習俗等特色文化，經澳門流向海外，對西方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澳門作為西方世界最初較為全面地矚望東方世界、接近東方文明的窗口，承載着全球地理大發現之後東方文明大發現的最初的完整記憶。在“西風東漸”形勢下，澳門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先進文化和制度進入內地的中介，也成為中國新思潮、新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有關中國與全球文明板塊互動、碰撞的歷史運作脈脈相通，澳門歷史的確屬於世界文明史框架中獨具特色的一部分。但是澳門歷史的研究在學科發展中如果只關注自身歷史記憶的挖掘和整理，而不把它提升到人類歷史發展的學術大河中去歸納和比較，則很難提煉出地方史中的全球意義。澳門學要想突破地區學的約束，不僅要思考澳門的獨特性是什麼，更要深入剖析在過去幾經沉浮的歷史發展中，澳門的獨特性是怎樣產生的？其產生的過程能提煉出哪些人類知識體系當中有比較價值的道理或哲理，而這才是澳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普泛性，也是澳門學的真正意義所在。可要真正將澳門學整理出地方知識體系的世界意義，則必須打破學科單兵作戰的格局，考慮建構起能夠體現一種學術自覺乃至學科自覺的澳門學框架。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闡析搭建澳門學學術框架的可能性。

二、澳門學應該研究什麼

澳門學並不能簡單停留在以澳門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研究為對象，以大量的澳門史料文獻和澳門社會現實為基本材料的地區性研究平台上，因為任何一個單一領域的澳門研究，哪怕是頗有建樹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都尚不具備能夠作為一門學問乃至學科獨立資格的學術屬性。

理想意義上，澳門學不應該是澳門研究的別稱，不應當局限於既有框定的研究領域與題材，僅圍繞着與澳門有關的資訊知識，或簡單凸顯研究對象與話題，或單純迭加澳門研究的相關內容，而應是有關澳門研究的一種學理的、質的、規定性的概括；建構並提供獨特又具有內在邏輯體系的學理認知系統。理想的澳門學不僅僅揭示圍繞着澳門及關於澳門的信息知識系統，更須呈現澳門知識系統所展示的歷史的、地域的、文化的學術特性；澳門學不應僅停留在有關澳門知識體系的特徵性概括，而應具有普泛性的概括，從世界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廣闊視野取其內涵的價值能量，從而顯現其學術輻射力和可以被學界引用和比較的深刻道理，使之具有可以被長期館存的學術價值。

這就是說，當一個如澳門研究這樣獨特的研究領域需要提升為一門類似於澳門學這樣的學問或者學科時，它需要精心設計和打造的是這門學問乃至學科的學術規定性，也就是它要取得能夠作為一門學問乃至學科的獨立學術資格的屬性。明確了這一點，就能夠有效地避免關於澳門學應該側重於有關澳門研究哪一個領域的爭辯，因為任何一個澳門研究領域，無論是澳門歷史文獻研究，還是澳門文化研究，還是當下澳門諸多問題的研究都僅僅是有關澳門的研究，不足以構成具有特定學術屬性的澳門學，它們都只是構建澳門學這座大廈的磚頭和木料。建構一個被稱之為“澳門學”的學問體系和學科框架，不是某一兩個有關澳門研究的學術領域所能承擔的工作，而且也不是有關澳門研究的所有學術領域簡單綜合起來就能完成的任務，其中必須經過嚴密的學理整合，深刻的理論探究，以及合適的研究方法和類似於建築設計的學術框架來聚合這些研究。這樣的學問體系和學科框架必須包含明確、科學而穩定的知識系統，包含鮮明、準確而獨立的學術特性，更須包含潛在但可以預知的學術影響力和整體輻射力^③。這是澳門學的價值展示，也是澳門學能夠從一般的澳門研究中擢拔出來並在具有國際視野的社會人文學術格局中具有某種獨立學術品性的基本依據。

每一個區域都可以成為學術聚焦點，但並不是每一個區域都可以像澳門這樣聚焦為一門獨特的學術體系。澳門學的成立首先基於其完整和引人入勝的知識系統，這是澳門學所以能夠成為超越於澳門的獨立學問並引人關注的基礎條件。澳門承載着其他地區研究都無法企及、無法媲美的歷史深韻，既包括豐贍而浩繁的典籍檔案，精緻而蘊蓄的自然人文景觀，亦有散逸在民間生活中的風俗人情乃至語言習慣等精神文化形態，無論從質還是量都彰顯出澳門歷史悠久深邃震撼的文化底蘊。與世界第九大文明奇迹的敦煌學相比，澳門具備立體多元的價值形態，物質與文字交相輝映的史證結構，以及大量材料有待長時間挖掘、解讀、整理、利用的學術格局。更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學的材料無論是物質的傳承還是精神的承載，無論是風物景觀還是文字記載，均從歷史中映照著現實，從現實中透析歷史，二者相互映照，其擁有的鮮活生機與敦煌學材料的死寂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④

任何一個文化區域都可能擁有屬於它的較為完備的知識系統，但這種知識系統倘若不具有明顯的特性和延續性，則很難為此建構真正的獨立學問。澳門的歷史文脈既有階段性，也有系統性和連續性，澳門文化從未斷層。^⑤從特性上看，澳門的發展史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史，這在內地歷史名城都是罕有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從而構成了當今澳門學無與倫比的豐富的知識體系。從延續性上看，澳門學要研究的對象不僅體現在靜態的建築文物和城市空間上，還活躍在動態的現實生活之中。中華民俗雖作為澳門民俗的基石，但自 16 世紀以來，以葡萄牙文化為主的西方文化傳入澳門後，給當地民俗注入了新的外來元素。在早期，兩種民俗有過衝突與碰撞，如 17、18 世紀澳葡官員、教會有人竭力反對中國居民在澳門舉行祭神遊行活動，甚至到 19 世紀初，教士們還極力干預澳門的媽祖神像遊行，企圖禁止中國籍教徒觀看，並專門發布“告誡書”，要求所有基督徒不能在街上或通過百葉窗偷看遊行，否則將被開除教籍。對於中國人習慣在紅白喜事時敲鑼吹號或者放烟花炮竹，澳葡政府也曾於 1883 年做出過宵禁規定。總體來看，兩種民俗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經歷過一種巧妙且充滿智慧的衝突與妥協的磨合，^⑥例如早期傳教士利瑪竇有感澳門當地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決心調整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政策，培訓後來傳教士學習中國話和中國風俗，還在中國人祭祖、祭孔的問題上作出了讓步。利氏所確立的“調適”傳教政策為後來湯若望、郎世寧等傳教士成功入華奠定了基礎。更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見證即是澳門著名的地標大三巴牌坊。該牌坊是聖保祿教堂保留下來的巴羅克風格的前壁，在五層高的有限空間裡用雕塑的方式展示天主教的基本教義，從天主到人間、耶穌基督受難的經過、聖母踏龍頭等故事。甚至還用中文刻上“念死者無為罪”和“鬼是誘人為惡”的警世之言，這在世界所有教堂上是絕無僅有的，形成了在澳門地區相互交融、共生發展的獨特局面。可以說，澳門學所要探究的文明，是在東西方不斷的文化和思想碰撞中發展起來的文明，以及這一文明在中西文化交流、交織、衝突與磨合的全部過程。

澳門學所負載的完整、詳備、鮮明而又多姿的知識體系，使其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一個獨特的存在。在 400 多年的歷史沉浮變遷中，澳門的每一步發展都交織着變幻莫測的國際風雲和複雜而深刻的國家命運。澳門與葡萄牙之間特殊的政治關係，則造就了澳門複雜而豐富的史學可能性，且使之遠遠超越了一般性的歷史常識範圍^⑦。可以說，獨具特色是澳門學能夠成為一門獨立學問的根本保證，也是澳門學在世界學科研究中的個案意義。400 多年來，澳門華洋雜處，留下了東西方文化和諧共生的深刻烙印。澳門擁有社會傳統造就的獨特的政治形態，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獨特的經濟狀態，中西交融的社會結構形成的獨特的文化生態，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各種澳門現象，如社團社會，家族模式，自由經濟，特色經濟結構，多元宗教，多族共存，多種語言

混合,古今文化共生,中外文明交融等等,無不呈現出澳門特有的色彩與風姿。歷史發展雜陳着進步的和落後的文明資訊,吸收着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因素,進而沉澱出濃厚、沉鬱的澳門味道和澳門特色的澳門文化與澳門現象,使得澳門學可以成為世界關注的對象,成為國際性的學問。澳門學的學術基礎、學術容量和學術範式的考察,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澳門學的學術價值,而這種學術價值的揭示,為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肯定理由。對於世界的中國學來說,澳門是中國文明乃至東方文明的最初模組;而對於中國的西方學來說,澳門則是西方世界投射到中國視域的原初鏡像。澳門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澳門學在中國與世界知識體系中具有別樣的風情和魅力。澳門學的全部學術指向 400 多年來中西文明交流史,指向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知,同時也指向世界文明史的學術重構。而這具有不可忽略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三、澳門學應該怎樣推進

如何將一項特定對象的研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學問,重點需要從其既有的學術知識體系和學問體系當中凝聚成一個具有標本意義的文化個案,而又能在當代世界性學術高度上提煉出一種對人類知識體系有所貢獻且可以被廣泛接受的道理與價值。這需要首先產生一個合乎現有學術規範並被學術界所認可的學術範式。據托馬斯·庫恩解釋,學術範式應是某一學科的策源地和矩陣(Disciplinary Matrix)。^⑧它不僅包含着由於所關心的共同問題而鬆散地聯繫在一起的特定群體,還包括共同認定的研究對象,針對該研究對象應該抽繹出何種問題,如何提出這些問題,解析和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方法,如何解釋研究出來的結果,以及如何概括由此產生的普遍性學術意義。^⑨

一定程度上講,學術範式具有元理論的特徵,因而不同於具體的研究方法,它是宏觀的、哲學的、理論的研究框架,能為人們對於特定對象的學術認知提供一種理論化的思路和聚合的包容性。每個學科研究領域均有屬於自己的研究範式。例如,在史學研究中,不同的學術範式對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走向有着不同的學術信念。以據實直書、客觀表述為範式的蘭克學派強調史料依據的重要性和不偏不倚的敘述傳統;而法國年鑒學派則傾向於從宏觀的、動態的、長時段的角度考察歷史的進化軌迹,進而探究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年鑒學派強調文明的擴散性,認為近代史就是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擴散的歷史。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們通常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不同的學術範式,試圖理解戰爭與和平,以及不同文明之間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互動與變遷。經濟學者則在分析和解釋經濟如何運作和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框架中,演化出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諸多經濟學範式。文化學者也用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範式來研究分析各種文化現象。

澳門學的發展需要一個具有統領學科階段性發展能力的學術範式,作為一門新興而獨立的學科,澳門學理所應當具有屬於自己的學術範式。作為一種共同持有的信念性的指導思想,澳門學範式可以從各種角度、用各種理論和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系統的探索,將經濟、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等不同學科相容到統一的範式框架內來對澳門文化和澳門現象加以解釋,最終梳理出屬於澳門學的“澳門道理”。

如何才能建構和打造“澳門學”的學術範式,使之成為獨立的學術體系?當前國際學術界有沒有合適的理論框架可以為我借鑒?由於澳門地方知識體系的特色是中西文明互動,近年來史學界興起的全球史觀可能對我們具有啓示意義。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提出文明擴散中的挑戰一應對模

式，強調文明的純粹性以及文明發展要經歷的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的四個階段。^⑩但這個學術範式要麼將歷史看成是靜止和孤立的，要麼將文明的擴散定義為以西方為主導向非西方的單向傳播，很少考察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影響。這種“歐洲中心論”的殖民史觀在學術界影響很大，一直到後殖民時代的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民主化理論都仍然有着“西方中心論”的味道。20世紀中葉後，英國史學家杰佛瑞·巴勒克拉夫首次提出全球史觀的概念，認為應當將西方歷史學重新定向，側重研究不同國家、地區和文明之間的差異、相互作用和影響，^⑪同時應當關注“跨文化互動”(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即“在考慮不同民族組織自身社會的獨特方式的同時，世界歷史應格外關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種方式。”^⑫

可以說，全球史觀最有魅力的核心理念是“文明互動說”。它打破了以往史學界所帶有的明顯的“只有西方才能產生真正的歷史意識與史學”^⑬的預設以及西方一東方的二元分析範疇，認為獨立的文明是可以相互交流和互相借鑒學習的。而人類文明正是在這樣的互動交流、學習和相互借鑒中前進並不斷豐富。這與早期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探討的“文明在空間中的接觸”和“文明在時間的接觸”概念也有所違背。湯因比的文明接觸、文明相遇理論包含着充滿暴力色彩的“文明衝突”觀點，即文明本身是遵循獨立發展原則的，而少有的文明接觸總是伴隨着一個或者多個文明的滅亡。對此，麥克尼爾否認文明獨立發展的觀點，提出“各自獨立的文明之間並不像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宣稱的那樣不能相互交流，事實上，只要文明之間發生了接觸，互動就會產生”。^⑭阿納森則在《理解文明際相遇》中分析了印度歷史上與西方文明的三次相遇，希臘—印度相遇，印度—伊斯蘭相遇和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即文明的相遇可能意味着暴力與毀滅，也可能存在着和平與互利。^⑮這為文明相遇提供了“文明互動”這樣的中性視角。^⑯

人類文明曲折而沉重的發展史見證的多是“血與火的洗禮”^⑰，一種文明以戰爭的方式與優勝的姿態征服另一種文明，而後者往往只能被動臣服並接受勝者的文明取代。^⑱事實上，文明的接觸與互動，決定着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發展歷史，各民族之間沒有優劣之分，都是在互動中吸收養分，甚至由於滲入雜質而變得更有生命力。因此，任何一種文化或文明，都不是單純的地方現象，而與不同國家、地區和文明存在某種關聯。^⑲有趣的是，東西方不同文明在澳門這樣一座東方小城相遇，非但沒有出現一個文明的勝利後另一個文明的解體與消亡，反而各美其美、蓬勃發展，更在相對平穩的演變之中幻化出了獨具特色的新的文明，也塑造出澳門人特有的“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澳門文化正是在過去幾百年的文明互動中平穩發展的一種文明，也是不同文明和諧相處的一個“人類文明實驗室”，其獨特的智慧提供着文明包容、互動與新生的“澳門經驗”。這一實驗的結晶之一是產生了土生葡人——葡萄牙人與亞洲人通婚的產物，這一被形容為“大地之子”的特殊群體正是東西方文明“互動相生”的具體樣態，其體質、婚姻、家庭、語言、宗教、風俗等方面呈現的特質，可以豐富人類學寡欲亞歐之間不同體質、文化、風俗的人種相互接觸和融合及其變遷過程的論述。^⑳“澳門有兩位上帝——葡萄牙與中國，他們善於調和生性不同並都以中庸之道為處世哲學，這並不違背福音。這是基督教教義與中國人智慧的結合物。事實上，耶穌、釋迦牟尼、孔子、老子為解決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和行為，開創了非暴力、對話、矛盾合一、自然和人類和諧的新紀元。”^㉑顯然，澳門中西文化相互接觸、交融，乃至新生，可以概括為文明的“互動相生”模式。這種“互動相生”的文明形態的存在和發展，為“澳門學”創立人類文明傳播與發展的新範式提供了學術上的可能。“非常引人深思的是，中葡在澳門的交往過程中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性，基本上在不捨棄自身傳統、不失去自我意識的前提下，努力地試圖了解、認識、尊重對方，盡可能自我調適、避免衝

突”^②。這種以文明互動為核心理念，提倡在地方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視角，成為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之互動關係的學術範式，為澳門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工具。^③澳門歷史的研究如果能從文明互動的歷史範式中去挖掘，會更加具有全球意義。通過不同文明互動來審視澳門，研究澳門，可以印證全球視野中澳門學的學術價值。

衆所周知，當今世界有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各國各地的歷史、語言、文化等各有差異，在社會發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等方面，更是存在着天壤之別。如何尊重這些差異性和多樣性，如何避免因政治理念和價值觀的不同而引發的戰爭衝突，如何使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實力和權力變遷不再以“血與火”的形式進行，是人類應從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文明互動的真實故事中所汲取的教訓。澳門作為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標本，提供了人類不同文明和諧共生，互動發展的特定範式，這種範式的解釋不僅有利於更深刻地認知澳門，而且為世界文明發展提供了一個文化融合的成功觀察點。可以說，澳門學的範式，應該是以研究不同文明的傳播模式，以“互動相生”為對象，用全球視野，挖掘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相處”的澳門樣本。研究澳門學，可以為今天世界解決各種民族衝突提供重要的啟示。過去那個非贏即輸、非生即死、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時代，應該讓位給一個承認差異、允許多元、謀求共存的非零和博弈的新時代。^④

自 16 世紀以來，澳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早期港口以及歷史上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重要樞紐，成為異體異質的文明類型相互運動並產生新型文明的重要舞台。在這裡上演了一場人類文明大碰撞、大融合以致孕育新文明的壯麗情景：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習俗的人們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由此誕生了既不同於中華文明，又迥異於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諧的“澳門文化”，亦即所謂“結合兩種不同文化而創造的第三文化”。^⑤澳門即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集散之地，也是新舊文化相安共處、並行不悖的和諧之地，這種和諧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構成了一個獨特而有意義的標本，其中的緣由與規律需要總結。澳門學以澳門的地方知識系統為基礎，以澳門的文化特性為基本研究對象，自覺地將澳門定位為中國乃至文明進程中的一個有價值的個案，通過這一個案的規律性解讀與理論性揭示，尋索其對建構人類和諧、健康的生活秩序和不同文明交融發展所具有的某種啟示作用。通過澳門歷史與文化及其特定生態的個案研究，從理論上總結出：文化和諧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必然聯繫；文化和諧與社會政治風貌之間的必然聯繫；文化和諧與社會心理機制條件的必然關係；文化和諧與社會生態乃至特定的文化地理之間的某種聯繫。^⑥這種種關係的理論解決，便可揭示澳門和諧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規律，這樣的規律性揭示，對於在世界範圍內營構和諧的文化環境和文化生態都有相當的啟發意義。澳門學應該通過這樣的研究和理論探尋，為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發展的可能性及其如何發展作出貢獻。這是澳門學倡導者應有的胸懷與願景，也是澳門學成立和發展的最終極也最輝煌的目標。

當然，澳門學的成立和發展須以翔實、深入且富有創造性的學術研究為標志，所有關於這門學問學術可能性的探索都只是一種理論思路的準備，研究情緒的熱身和學術環境的營造，大量艱苦的工作和努力是為了將這種學術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學術性。這其中尚需要系統而有效的方法論的設計與建構，需要較大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系統而全面地建構澳門學材料的收藏、整理和解讀體制，需要調動具有國際學術背景的專家力量，對於澳門學的知識系統、學術特性，以及澳門現象及其規律隱含着的學術能量和影響力作出深刻而富有穿透力的理論歸納和總結。

四、小結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和重要節點，數百年來，澳門一直發揮着中西文明交流

的門戶作用,積累了不勝枚舉的文化遺產和豐厚的文化底蘊,既對中華文化的傳統有着很好的保留,同時也對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認識。東西方文化在澳門這座小城並存、碰撞、互通和互融,賦予了這座小城獨特的“中西交融,多元共存”的文化魅力,使得澳門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中具有先天的優勢條件。

澳門學就是基於對澳門本土知識深入了解以及系統性知識體系重建的雙重目標而提出的一門學問。澳門學是從澳門獨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歷史經歷中滋生出來的。然而,本土知識都有地方性知識的特色,或多或少都有一種排斥普適性的傾向,這又明顯不符合澳門東西方文化巧妙融合的文化特性。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在1995年被授予澳門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曾坦言:“人們發現澳門從來就是一個各種思想相互寬容的社會。在澳門,葡萄牙的人文主義和中國的宇宙觀和諧相處。中西方文明相互尊重,互相學習。在澳門,這種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精神給各種文化增添了光彩。不言而喻,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②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澳門學應該而且也必須超越於本土知識體系。

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撰文道:“數百年歷史發展告訴我們,澳門是中華文化傳統基因保存最好、延續性最強的一座城市,也是最充分、最持久展示中華文化開放性和包容性的一座城市,並且充分展現出了融合中西文化對話、溝通的技巧和能力,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③從根本上說,“澳門學”生於澳門,卻遠遠超越澳門。這種生生不息、從未斷層的歷史文脈塑造了澳門學的特殊性,也賦予了澳門學無與倫比的獨特學術內涵。澳門學應當將澳門的經歷和經驗納入全球化和世界現代化的宏闊視野,突破歷史的、地域的、文化的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對澳門的歷史和當下現象進行系統化整合,建構一整套規定性的、獨特的而具有內在邏輯體系的學理性認知系統,並能夠提煉出具有全球意義、學理意義的知識和學問體系。

當今,正是冷戰結束三十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四十年階段性成果的時期,歷史似乎又站在了新的拐點,開始召喚一種全新的走向和合的觀念。人們開始意識到一個不同於西方的選擇。這種和合觀念讓我們不再以槍炮和制裁為手段,也不再以經濟利益的擴張和掠奪為動力,也不再以某一方的絕對制勝和獨領風騷為目標,而是真正呈現出一種承認差異的、互相尊重的、和諧共存的、多元斑斕的圖景;而澳門學所能揭示的道理會為人類提供不同文明的融會共榮的智慧和巧妙的生存之道,這將是澳門學貢獻給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重要一筆。

①②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序言,蘇勤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③1986年11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行座談會,提出建立“澳門學”的創議;1989年2月,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前身)舉辦“澳門學”學術研討會,討論“澳門學”的對象、方法及其意義,對“澳門學”的概念作了初步界定;1994年,澳門大學再次召開“澳門學”問題研究的專題討論會;2000年11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舉辦“澳門學”的

對象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對“澳門學”多年來的研究做了一次階段性總結。上述論文都是這些會議的成果。同時參見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澳門:《澳門研究》,2010年第1期。

④有關澳門學定義的討論,參見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代前言)第2頁;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

- 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郝雨凡：《澳門學：中西文化互動共生的範型》，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2日。
- ④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
- ⑤⑩參見于茗卉、郝雨凡：《互動相生：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範式——回歸20年澳門學的發展與未來之路》，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3期。
- ⑥參見楊仁飛：《澳門民俗：一幅絢麗多姿的畫卷》，見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135~1156頁。
- ⑦參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14~121頁。
- ⑧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3r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176- 191. 中譯本見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⑨Margaret Masterman,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 I. Lakatos och A. Musgrave.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also see Dudley Shapere,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LXXI-II (1964), pp. 383- 394.
- ⑩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第16頁。
- ⑪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6. p. 10.
- ⑫傑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公元1000年之前）》第5版，魏鳳蓮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⑬Micol Seigel, “World History s Narrative Problem”,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4, 2004, p. 431.
- ⑭William H. McNei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1995), pp. 8- 26.
- ⑮Johann P. Arnason, “Understanding intercivilizational encounters”, *Thesis Eleven* 86, no.1 (2006), p. 41.
- ⑯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 ⑰⑱參見郝雨凡在北京論壇“世界政治變遷與文明的互動”研討會上的發言：《未來世界政治的走向——從衝突中求勝利到在和諧中求多元》，2008年11月13日。
- ⑲劉新成：《文明互動：從文明史到全球史》，北京：《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
- ⑳卡布拉爾：《澳門的族群構成》，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期，《“澳門土生人”特輯——人類學、歷史和文化》，1994年。
- ㉑參見吳志良：《以全球史視野深入解讀澳門歷史》，澳門：《澳門日報》，2010年3月10日。
- ㉒吳志良：《中華文化傳統在澳門的傳承和發展》，澳門：《行政》，2005年第70期。
- ㉓婁勝華：《澳門學需要明確的幾個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年第1期。
- ㉔參見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瀋陽：《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1期。
- ㉕池田大作：《在澳門大學授予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儀式上的答謝講話》，黃漢強：《第十屆澳門社會科學年會開幕辭》，澳門：《濠鏡》，1997年總第15期。
- ㉖吳志良：《總結澳門歷史經驗，弘揚中華文化傳統》，澳門：《澳門日報》，2018年9月19日。

作者簡介：郝雨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席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責任編輯 劉澤生]